

引用格式:

罗媛月, 张会萍, 冷泽源. 财政扶持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以宁夏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3, 44(6): 1024-1035.

Luo Y Y, Zhang H P, Leng Z Y. The impacts of financial support on the public service supply of village leve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 case study of Ningxia[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3, 44(6): 1024-1035.

DOI: 10.13872/j.1000-0275.2023.0099



财政扶持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 ——以宁夏为例

罗媛月, 张会萍*, 冷泽源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宁夏银川 750021)

摘要: 有效解决我国村级公共服务供给问题, 明确村集体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重要地位, 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保障。本文以宁夏为例, 利用村庄实地调研数据, 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探讨财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政策对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和对不同村庄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 获得100万元和200万元财政扶持资金的村庄占比分别为45.5%和13.2%, 其中获得200万元财政扶持资金村庄的村级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最为明显。财政扶持政策能够有效促进村级公共服务的总供给和公共事业供给; 在各项公共服务供给中, 财政扶持政策对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文化活动场所、困难老人养老金和办公经费的促进作用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 财政扶持政策的作用效果在近郊村和大型村更为突出, 并且扶持力度越大、作用时间越长, 政策效果越明显。因此, 建议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于村级集体经济的扶持作用, 并采取因地制宜、因村制宜的政策实施方案, 持续发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村级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核心作用, 以提升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关键词: 财政扶持; 村级集体经济; 村级公共服务供给; 公共产品供给; 公共事业供给; 倾向得分匹配

中图分类号: F81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75(2023)06-1024-12

The impacts of financial support on the public service supply of village leve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 case study of Ningxia

LUO Yuan-yue, ZHANG Hui-ping, LENG Ze-yu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Ningxia 750021, China)

Abstract: Effectively solving the problem of village level public service supply in China and clarifying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village collective organizations in public service supply are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achiev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an onsite survey data in Ningxia and applying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impacts of the fiscal support to strengthen village 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policies on village level public service supply and analyzed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s on different village level public service supply.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rtions of villages receiving 1 million yuan and 2 million yuan of financial support funds are 45.5% and 13.2%, respectively. Among them, villages receiving 2 million yuan of financial support funds have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ir village level public service supply capacity. Financial support policie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overall supply of village level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supply of public utilities. In the supply of various public services, fiscal support policies have a stronger promoting effect on household waste treatment facilities, cultural activity venues, pension for the elderly in need, and office expens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fiscal support policies is more prominent in suburban and large villages, and the greater the support and the longer the effective period, the more obvious the policy effect. Therefore, to enhance the public service supply capacity of villages, this paper suggests: fully leveraging the supportive role of fiscal policies for village 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adop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plan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villages, and continuously playing the core role of village leve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th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at the village level.

Key words: fiscal support;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village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public product provision; public utility provision;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063027); 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2NXBYJ02); 宁夏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NXYLXK2017A02)。

作者简介: 罗媛月(1994—), 女, 河北承德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公共政策与农村发展研究, E-mail: luoyuanyuex@163.com; 通信作者: 张会萍(1964—), 女, 河北唐山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公共政策与农村发展研究, E-mail: zhp0329@sina.com。

收稿日期: 2023-09-27; **接受日期:** 2024-01-05

Foundation item: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72063027); Ningxia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Planning Project (22NXBYJ02); Achievements of the First-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rogram of Ethnology in Ningxia University (NXYLXK2017A02).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Hui-ping, E-mail: zhp0329@sina.com.

Received 27 September, 2023; **Accepted** 5 January, 2024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持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相比城市地区，广大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仍存在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1]。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投入对于提高集体成员生活质量发挥着积极作用^[2]。具体地，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对增强农民幸福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起到重要作用^[3]。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显，截至2021年，全国54.7万个行政村中，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无经营收益的村占比为21.1%，经营收益不足5万元的村占比为19.7%。两项占比相较2016年的51.5%和23.4%虽有所好转，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仍较差，并存在部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运转靠“补”，基础设施建设靠“要”，公益事业靠“捐”的情况，这与大量公共产品、社会公益事业、农村管理经费等常规性支出长期处于刚性增长态势的现实形成突出矛盾^[4]，即农村居民对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和空间环境宜居的需求日益增长，但村级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与质量存在双重落后^[5]。基于此，激活村级集体经济的自我“造血”能力，成为解决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关键。而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实力，进而提高其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既往研究围绕村级公共服务供给影响因素、现存问题和供给主体等展开讨论，认为村级公共服务存在供给不足、供给失衡与供求错位等问题^[6]，村级集体经济结构、村庄人口空心化、村庄规模等是影响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因素^[7-8]，基层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技术水平是有效实现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因素^[9]。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村域内的村民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改善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的分析单元应划分到村级层面^[10]，王奎泉和赵玲玲^[11]研究表明政府将村级组织作为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时，能够提高村级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财政资金作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基础前提，解决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的初始资金匮乏的束缚，消除了大量“空壳”村，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普遍进入稳定发展状态^[12]。同时，财政扶持村级集体经济能够调动村集体进行各项公共事务供给的积极性，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及效率^[13]，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起到了承接国家政策和资源并向外提供

公共服务的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14]。总之，财政资金投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既能够盘活集体资源与资产，撬动集体增收，客观上以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减少政府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直接开支压力，利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实现村庄简约有效治理^[15]。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参考。但鲜有文献关于财政投入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展开深入探讨，尤其是缺乏基于一手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鉴于此，本文以宁夏为例，利用财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政策试点的462个实地村庄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探讨财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政策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通过更换匹配方式、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分析财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政策对不同村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的异质性。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丰富了财政扶持影响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理论和经验证据，极大地拓展了相关主题研究视域。第二，拓宽了财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政策经济效果的研究。第三，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优化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以及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1 制度背景和理论分析

1.1 财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试点政策的内容

财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政策（后文简称“财政扶持政策”）是帮助实现村级集体经济壮大，进而提高村级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重要制度探索。2015年财政部印发的《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完善村级集体公益金、公积金制度，支持农村公益、扶贫济困等事业发展，增强村级集体自我保障能力；要增加村级公共服务投入，探索通过政府优先购买村级集体提供的相关服务，不断提高村级公共服务质量和能力”。2016年中央财政选择包括宁夏在内的13个省份开展试点，旨在通过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提高村级集体自我发展的能力，更好地进行公共服务供给等民生福祉。

在中央相关政策文件出台之后，宁夏自治区财政对试点县（市、区）给予配套财政扶持资金，试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6—2018年，每年中央财政对宁夏每个试点村一次性补助100万元，自治区财政配套100万元，每个试点村共200万元扶持资金用于实施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试点工作。第

二阶段为2019年之后,中央财政每年补助宁夏388个试点村,每村50万元标准,自治区财政1:1比例配套,每个试点村共100万元扶持资金用于实施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试点工作。

1.2 财政扶持政策对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实施强化了中央政府的税收管理权^[16],地方财政自主权不断收缩,造成了财政收入和税收权利的上移^[17-18],从而导致财权的层层上移和事权的层层下移,地方政府面临着缺少财政资金支持并承担众多公共服务支出的双重压力,使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供给不作为现象^[19]。之后“三提五统”全面取消,我国大多数村庄自主提供公共品的能力又发生了显著降低^[20],虽然后续推出的村级公共服务供给“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共服务供给的缺失,但供给力度不足、补助范围局限性过大的问题仍然存在^[21],广大村级公共服务供给问题仍亟待改善。同时,由于村级公共服务供给对于基层经济发展水平的过度依赖,造成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着不同区域间及同一区域不同村庄间的明显差异^[22-23],这种上级出政策,下级出资金的局面,会让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政府更容易陷入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的困境^[6]。

村级公共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表明村级的公共服务供给并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市场的逐利本质会使得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的公益性和公平性难以保证,同时我国并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和法律条例来保障市场提供村级公共服务的可行性^[24],而政府项目制又存在着一系列诸如供需错位、基层寻租等问题,造成了落实成本高^[25]、项目实行困难出现“最后一公里”窘境^[26]等后果,因此实现村庄公共服务的自我供给是契合村民需求、完善项目实施、提高村庄公共服务水平的良好方案。

公共服务供给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重要职责,也是村级治理是否有效的一项绩效指标^[27]。一方面,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进行公共服务供给时,通过内部协调与管理,能提高村级不同种类公共服务供给的平衡性与适配性;另一方面,在供给过程中,村级组织还能作为中介帮助政府与村民沟通,协助当地政府工作^[28]。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利用集体资源进行公共服务供给时,能激活村庄中非正式的权威力量,通过充分的利益博弈达成妥协,实现公共服务的供需匹配;而且由于村级集体主导着公共资源的使用,能持续进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避免了“悬浮型”政权的问题,也实现了村级

公共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国家在向村庄输入资源时,应当发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性^[29]。通过典型案例研究,认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是对现有方式的有效补充,能激发其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双重动力,能内生地解决公共品供给问题。因此,在财政资金投入的基础上采取村级集体组织作为村级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方式,能够有效化解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的组织困境与资金缺乏^[30-32]。财政扶持政策通过鼓励村庄探寻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或投资方向,给予发展的第一桶金,并采取适度监管的原则充分释放村庄的自我发展潜能,实现村级集体经济的壮大,进而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提供重要支撑。现有研究表明,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为村级公共服务供给提供直接的支持,并能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及效率^[13]。有学者通过对村书记的调查发现,村庄的集体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村级公共服务供给情况^[33]。因此通过配套的财政投入和扶持政策,创新实现政府主导和村级集体参与的村级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能够显著提升供给绩效,最终实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村级公共服务提供的良性循环^[23,34]。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财政扶持政策能够提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1.3 财政扶持政策对不同特征村庄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

受村庄不同特征影响,财政政策的发挥效果也会产生差异。村庄人口规模是影响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决定着集体经济的各项资本投入和治理机制,人口规模越大,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就越丰富^[35]。但现有研究分析不同人口规模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结论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村庄规模对村级公共服务供给存在负面影响,而村庄密度与其正向相关^[7]。但雷丽霞等^[10]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进行分析时发现,村庄人口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村级生产性公共服务的供给。人口规模越大的村庄,往往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旺盛,同时较大的人口规模也更加容易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公共服务的提供也更加合理有效。

除人口规模外,村庄的位置距离也会对其公共服务供给情况产生影响。村庄距离县城越近,更容易受到县城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拥有更加丰富的收入来源,同时近郊村拥有更强的学习模仿效应,在产业选择方面会更加完善,使得近郊村的村集体收入会高于远郊村,因此财政投入在近郊村会产生更大的收入效应,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同时

近郊村受县城完善的公共服务影响，对公共服务供给的需求量会更大，反向促使村委会增加对于公共服务供给支出的重视。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在大型村和近郊村实施财政扶持政策对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提升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的效果更突出。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课题组2021年12月对宁夏部分行政村的实地调研数据。宁夏既是第一批财政扶持政策试点的地区，又是民族地区、典型欠发达地区，以此研究区域获取的样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调研区域覆盖宁夏所有地级市，并根据各地级市的规模和集中程度，采用层级取样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共选取了17个县（区），每个县（区）根据距离县城远中近的原则，选取3~5个乡镇，并着重选择仍有未被扶持村庄的乡镇，形成对照组，共选取了55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8~10个村，共获得有效样本462份。调研内容主要包括村庄基本信息、财政扶持情况、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公共服务供给情况、村支书个人信息等。

2.2 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选择村庄公共服务总供给、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事业供给为本文被解释变量。根据现有研究对公共服务广义概念的界定^[23]，按存在形式，村级公共服务可以细分为公共产品和狭义的公共服务即公共事业两个方面。其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选择了道路桥梁、农田水利设施、生活污水排放管道、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作为衡量指标；农村公共事业供给选择了文化活动场所、村卫生诊所、

老年饭桌、村幼儿园、学生教育补助金、困难老人代缴养老金、办公经费作为衡量指标。

2) 解释变量。选择财政扶持村级集体经济为解释变量，试点村取1，否则取0。

3) 匹配变量。主要包括村庄基本特征和村支书特征变量。其中，村庄基本特征选择用本村常住总人口的数量来衡量村庄规模，选择用第一姓氏人口所占比例来衡量村庄的宗族结构，选择用本村务农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衡量村庄的务农比例，选择用本村人均年收入来衡量村庄的经济水平，还考虑了村级集体账户债务可能存在的差异和影响，同时选择了村庄的地形特征和地理位置来衡量其地理信息，以及村庄是否有驻村干部。村支书特征变量，本文选择了村支书年龄，一般村支书年龄越大，生活阅历越丰富；选择的村支书任期年限是其担任村干部的年限，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其在村级集体中的威望和村民的认可程度。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2.3 模型设定

财政扶持政策的实施，需要经过村级集体申报、乡镇选拔、县政府审批等流程。因此，一个村庄能否得到该财政扶持政策的帮扶，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做出的选择，该政策受自主选择行为的影响，并非完全随机选择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进行评估就可能出现样本自选择偏误的问题^[36]，为控制这种偏误对实证结果带来的影响，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37]，来估计财政扶持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基本思想是找到与处理组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的含义及计算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公共服务总供给	村级集体自费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事业总金额（万元），取对数	0.946	1.083
	公共产品供给	村级集体自费建造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金额（万元），取对数	0.702	0.961
	公共事业供给	村级集体自费发展各项公共事业的金额（万元），取对数	0.427	0.765
解释变量	财政扶持村级集体经济	村级集体是否享受财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政策：是=1，否=0	0.586	0.492
匹配变量	村庄规模	本村常住人口数量（人），取对数	7.415	0.619
	宗族结构	本村第一大姓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	34.702	21.636
	务农比例	本村务农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	44.614	24.499
	人均收入	村民人均年收入实际金额（元），取对数	9.418	0.284
	村级集体账户债务	村级集体账户的实际债务金额（万元）	5.771	28.062
	村庄地形	村庄是否位于山区：是=1，否=0	0.454	0.498
	村庄地理位置	本村距离县城的距离（km）	22.934	17.790
	是否有驻村干部	是否有驻村干部：是=1，否=0	0.746	0.435
	村支书年龄	村支书的实际年龄（岁）	43.175	7.818
	村支书任期年限	村支书担任村干部的年限（年）	8.718	7.988

尽可能相似的对照组，将多个特征浓缩成一个指标——倾向得分值，以此表示样本村庄参与政策的条件概率，从而使多元匹配成为可能。本文使用 Logit 模型计算得出村庄参与财政扶持政策的倾向得分。

$$P(X_i) = P[D_i = 1|X_i] = \frac{\exp(\beta X_i)}{1 + \exp(\beta X_i)} \quad (1)$$

式中： $P(X_i)$ 为村庄 i 参与财政扶持村级集体经济政策的倾向得分值， X_i 为影响村庄参与的相关匹配变量， β 为参数向量。

根据计算出的倾向得分值为处理组寻找其“反事实”对照组，即以倾向得分为基础，找到与每个实验组样本村庄最为匹配的对照组样本村庄，并通过两组之间的差值，即平均处理效应 ATT，来反映实施财政扶持村级集体经济政策对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的净效应：

$$\begin{aligned} \text{ATT} &= E[Y_{1i} - Y_{0i}|D=1] \\ &= E\{E[Y_{1i}|D_i=1, P(X_i)] \\ &\quad - E[Y_{0i}|D_i=0, P(X_i)]|D_i=1\} \end{aligned} \quad (2)$$

式中： Y_{1i} 和 Y_{0i} 表示同一村庄参与财政扶持政策与未参与财政扶持政策两种情况下的结果变量。

2.4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保证估计结果稳健可靠，采用两种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为了检验财政扶持政策的公共服务供给效果是否稳健，将人均公共服务供给金额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从供给效率角度考察财政扶持政策的影响。二是替换解释变量。本文实证结果证明村集体参与财政扶持政策对村级公共物品提供具有积极作用，为了更好的衡量村集体参与政策的效果，将解释变量替换为“村集体参与财政扶持政策是否获得收入”，再次进行检验。

3 结果与分析

3.1 财政扶持政策实施与村庄公共服务供给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调研样本中，共有 271 个村庄受到了财政扶持，191 个村庄未受到财政扶持，其中获得 100 万元财政扶持的村庄占比为 45.5%，获得 200 万元财政扶持的村庄占比为 13.2%（表 2）。获得 200 万元财政扶持资金村庄的村集体总收入为 32.697 万元，明显高于未扶持村庄的 11.426 万元，而获得 100 万元财政扶持资金村庄的村集体总收入仅比未扶持村庄高 2.063 万元。与此同时，获得 200 万元财政扶持资金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也明显高于未扶持村庄，差值为 7.302 万元，远大于获得 100 万元财政扶持资金的村庄与未扶持村的差距。

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获得财政扶持村与未获得财政扶持村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均值差异。结果表明，未获得财政扶持村的公共服务总供给、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事业供给均值分别为 3.479 万元、2.838 万元和 0.640 万元，而获得财政扶持村的公共服务总供给、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事业供给分别增加 2.159 万元、0.163 万元和 1.996 万元（表 3），其中公共服务总供给和公共事业供给在统计意义上显著，说明政策扶持使得村庄公共服务供给得到了提升，改善了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状况。但统计指标的显著差异也可能是受到村庄特征等因素的影响，而并非全部为财政扶持政策导致，因而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

3.2 村庄参与财政扶持政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估计结果显示，务农比例对村庄是否参与财政扶持政策产生正向影响（表 4），务农人数比例越高的村庄，说明其空心化程度相对较低，村庄人口较多，更利于获得财政扶持。而宗族结构、村级集体

表 2 宁夏财政扶持政府实施与村级集体经济情况

Table 2 Financial support for government implementation and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in Ningxia

财政扶持情况	村庄数	占比 (%)	村集体总收入 (万元)	公共服务总供给 (万元)
未扶持村	191	41.3	11.426	3.469
获得 100 万元财政扶持的村庄	210	45.5	13.489	4.157
获得 200 万元财政扶持的村庄	61	13.2	32.697	10.771

表 3 相关变量不同分组的均值比较 (万元)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means of different groupings of related variables

变量	政策未扶持村		政策扶持村		均值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公共服务总供给	3.479	0.656	5.639	0.811	2.159*
公共产品供给	2.838	0.634	3.001	0.432	0.163
公共事业供给	0.640	0.098	2.637	0.605	1.996***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4 基于Logit模式的村庄获得财政扶持的估计结果
Table 4 Estimates of villages' access to financial support based on the Logit model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Z值	$P> Z $
村庄规模	0.024 4	0.041 8	0.58	0.560
宗族结构	-0.002 1*	0.001 1	-1.96	0.051
务农比例	0.002 1**	0.001 0	2.19	0.029
人均收入	0.100 5	0.062 2	1.62	0.107
村级集体账户债务	-0.000 5**	0.000 2	-2.24	0.025
村庄地形	0.038 4	0.054 2	0.71	0.479
村庄地理位置	-0.002 8**	0.001 4	-1.97	0.049
是否有驻村干部	-0.143 1**	0.058 1	-2.46	0.014
村支书年龄	-0.004 5	0.003 4	-1.32	0.187
村支书任期年限	0.003 7	0.003 3	1.12	0.263
_cons	-0.208 9	0.681 3	-0.31	0.759
Pseudo- R^2	0.081			

注：回归中均采用robust稳健型标准误（下同）。

账户债务、村庄地理位置和是否有驻村书记对村庄是否参与财政扶持政策产生负向影响，具体而言，村内第一大姓占比越高，说明村内容容易出现高度集权的情况，发展思路较为局限；较多的村级集体账户债务会影响政府对于村内发展前景的评估，使村庄获得财政扶持的机会减少；村庄地理位置较远，产业发展较近郊村落后，发展环境较差，获得财政扶持的比例较低；而有驻村书记的村庄更容易获得由驻村书记个人所带来的项目和资金，因而较难获得财政扶持。

3.3 财政扶持政策对村级公共服务总供给的影响分析

根据村庄参与财政扶持政策的决策模型估计结果计算出村庄参与政策的倾向得分，为了确保倾向得分匹配结果的准确性，仍需进一步进行共同支撑检验与匹配平衡性检验。为更好的观察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共同支撑范围，本文分别绘制了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匹配前两组样本

的倾向得分分布有较大差距，匹配后差距明显缩小，并且大多数观测值均在共同支撑域范围内，倾向得分匹配损失样本较少，并且匹配后两组样本倾向得分的核密度函数较为接近，匹配结果较好，满足共同支撑假设。

此外，仍需通过匹配变量的误差消减来检验所建PSM模型的合理程度，并用PSM的平衡性检验来考察匹配效果。参考Rosenbaum和Rubin^[38]的标准对整体平衡性进行评估。在匹配后，所有匹配变量的标准化偏差绝对值小于10%（表5），对应T检验的结果均不能拒绝处理组与对照组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因此，可以看出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村庄在所有解释变量上均不再有显著差异，两组间的系统差异得到有效控制。

此外，为了保证所建PSM模型的匹配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6种匹配方式。可以看出，在不同匹配方式下 $Ps R^2$ 值由匹配前的0.058显著下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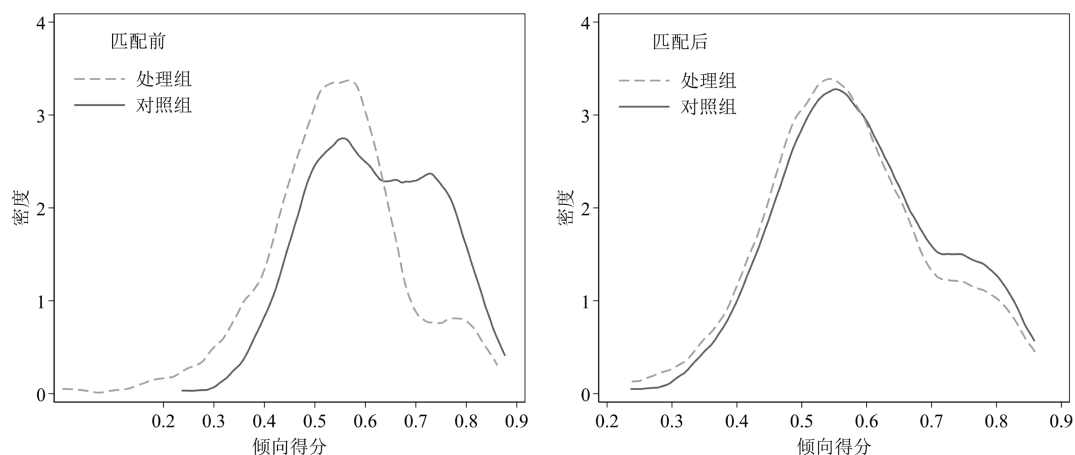


图1 匹配前后核密度函数图

Fig. 1 Density function plot before and after matching

表 5 匹配前后控制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Table 5 Balance test results of the control variables before and after matching

变量	匹配状态	处理组	对照组	标准化偏差	T 值	标准偏误减少
村庄规模	匹配前	7.445	7.372	11.8	1.26	95.3
	匹配后	7.440	7.437	0.6	0.06	
宗族结构	匹配前	32.560	37.743	-23.9	-2.55**	98.6
	匹配后	32.738	32.663	0.3	0.04	
务农比例	匹配前	45.298	43.645	6.7	0.71	-21.9
	匹配后	44.909	42.895	8.2	0.93	
人均收入	匹配前	9.438	9.389	17.3	1.84*	63.4
	匹配后	9.436	9.418	6.3	0.75	
村级集体账户债务	匹配前	4.409	7.702	-11.0	-1.24	67.4
	匹配后	4.458	3.386	3.6	0.63	
村庄地形	匹配前	0.416	0.507	-18.3	-1.94*	98.3
	匹配后	0.421	0.423	-0.3	-0.04	
村庄地理位置	匹配前	20.499	26.392	-32.6	-3.55***	94.5
	匹配后	20.668	20.342	1.8	0.24	
是否有驻村干部	匹配前	0.678	0.842	-39.1	-4.05***	97.9
	匹配后	0.686	0.683	0.8	0.09	
村支书年龄	匹配前	43.133	43.236	-1.3	-0.14	-282.4
	匹配后	43.198	43.591	-5.0	-0.58	
村支书任期年限	匹配前	9.048	8.251	10.1	1.06	89.7
	匹配后	9.048	9.130	-1.0	-0.12	

了 0.004~0.009, LR 统计量由 36.47 下降到了 5 左右, 均值偏差和中位数偏差下降到 5% 以下, 似然比检验的 P 值也表明配对后两组样本的协变量的均值差异不再显著 (表 6)。以上结果说明, 倾向得分匹配有效减少了两组样本之间的系统性差异, 匹配结果

通过平衡性检验。

在通过 PSM 相关检验后, 6 种匹配结果基本一致 (表 7), 说明所得结论具备稳健性, 财政扶持政策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服务总供给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可能的原因在于财政扶持政策能够增强村

表 6 模型的平衡性检验

Table 6 Balance test of the PSM model

匹配方法	$Ps R^2$	LR 统计值	P 值	均值偏差 (%)	中位数偏差 (%)
匹配前	0.058	36.47	<0.001	17.1	14.1
k 近邻匹配 (1:2)	0.006	4.84	0.939	3.9	3.1
k 近邻匹配 (1:4)	0.004	3.19	0.988	3.5	3.6
卡尺匹配	0.005	3.61	0.963	3.0	1.9
卡尺内 k 近邻匹配	0.007	5.06	0.928	4.0	3.1
核匹配	0.005	3.80	0.956	3.1	1.9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0.009	6.43	0.843	4.3	5.0

表 7 财政扶持政策对村级公共服务总供给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Table 7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impacts of fiscal support policies on the aggregat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at the village level

匹配方法	处理组	对照组	ATT	S.E.	T 值
k 近邻匹配 (1:2)	1.036	0.744	0.292**	0.124	2.34
k 近邻匹配 (1:4)	1.036	0.829	0.207*	0.115	1.79
卡尺匹配	1.036	0.836	0.200*	0.108	1.85
卡尺内 k 近邻匹配	1.036	0.831	0.205*	0.113	1.81
核匹配	1.035	0.820	0.215**	0.104	2.06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1.036	0.821	0.214*	0.124	1.72

注: 卡尺匹配中的卡尺范围设定为样本估计的倾向得分标准差的 1/4, 经计算后, 卡尺匹配的卡尺范围为 0.05, 卡尺内 k 近邻匹配是卡尺范围为 0.05 的 1:2 匹配, 核匹配使用默认带宽 0.06;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使用默认的 tricube 核函数和默认的 0.8 带宽值。

级集体经济组织自我造血功能，实现村级集体经济增收，从而有更多的资金提供村级公共服务供给，可见财政扶持对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服务供给的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的结论一致^[29]。

3.4 财政扶持政策对各项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分析

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显示，财政扶持政策对村级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均不显著，但对村级公共事业供给的影响较大，结果都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表8）。可见财政扶持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增加公共事业供给的作用更突出。可能的原因在于，道路桥梁、农田水利设施等村级公共产品是耗资较大的建设项目，对于发展初期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而言负担较重，更多依赖政府的专项资金。相比之下，与村民日常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公共事业供给项目所需资金量较小，在财政扶持政策的作用下增长较为明显。

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财政扶持政策仅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投入的增加起到显著作用，对于其余三项的作用并不显著（表9）。由于道路桥梁、农田水利设施和生活污水排放管道都属于大型基础设施，造价较高，村级自主投入建设相对困难，同时

这三项设施的建设需要符合一定的规范标准，建设较为复杂。相比之下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投入较小，建造成本较低，并且《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20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因而各村庄较为重视对生活垃圾的处理。

在公共事业供给方面，财政扶持政策对于文化活动场所、帮助困难老人代缴养老金和办公经费开支的提高作用显著，但对于村卫生所建设、老年饭桌、村幼儿园的建设 and 学生教育补助金这几个方面，没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表9）。可能的原因在于，在文化活动场所建设上，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后，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重要，为满足村民对公共文化设施和开展文化活动的需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加大对文化活动场所供给的投入比例；另一方面，部分村庄借助本村的特色民俗、非遗技艺和自然景观等人文地理资源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选择开展乡村旅游、特色文化产业，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重视对文化活动场所的建造。为困难老人代缴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保障功能，能够保障农村无收入老人的晚年生活，这类支出能体现并增强村庄的凝聚力，因此对于财政扶持村而言，在村级集体经济得到发展而

表8 财政扶持政策对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事业供给的平均处理效应

Table 8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fiscal support policies on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nd public utilities at the village level

匹配方法	公共产品供给			公共事业供给		
	ATT	S.E.	T值	ATT	S.E.	T值
k近邻匹配(1:2)	0.026	0.111	0.24	0.187**	0.077	2.42
k近邻匹配(1:4)	0.053	0.101	0.52	0.195***	0.073	2.64
卡尺匹配	0.094	0.095	0.99	0.179**	0.070	2.55
卡尺内k近邻匹配	0.094	0.095	0.99	0.179**	0.070	2.56
核匹配	0.092	0.095	0.97	0.179**	0.070	2.56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0.082	0.113	0.73	0.190**	0.082	2.30

表9 财政扶持政策对各项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的平均处理效应

Table 9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fiscal support policies on the provision of various village public services

变量	变量分类	处理组	对照组	ATT	S.E.	T值
公共产品供给	道路桥梁	0.400	0.433	-0.032	0.091	-0.36
	农田水利设施	0.346	0.390	-0.043	0.078	-0.56
	生活污水排放管道	0.033	0.018	0.014	0.015	0.97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0.180	0.082	0.097**	0.043	2.22
公共事业供给	文化活动场所	0.164	0.055	0.109**	0.050	2.17
	村卫生所	0.020	0.041	-0.021	0.017	-1.23
	老年饭桌	0.066	0.016	0.050	0.033	1.52
	村幼儿园	0.002	0.000	0.002	0.002	1.07
	教育补助金	0.114	0.096	0.017	0.032	0.56
	困难老人养老金	0.120	0.054	0.066**	0.030	2.15
	办公经费	0.134	0.061	0.072**	0.036	2.02

进行公益金分配时,为困难老人代缴养老金这项支出会被优先考量。此外,由于财政扶持村比财政未扶持村的公共管理事务更多,需要定期对财政扶持资金的使用、村庄产业经济的发展事宜等进行讨论,由此会需要更多的办公经费开支。

3.5 稳健性检验分析

在更换被解释变量定义后,财政扶持对人均公共服务总供给和人均公共事业供给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而对人均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不显著(表 10),与本文基准回归一致;在更换解释变量定义后,其结果同样与本文基准回归大致相同,证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3.6 组群差异分析

1) 不同财政政策扶持力度对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宁夏在财政扶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根

据前后政策变化分为两个阶段,2016—2018 年的总扶持金额为 200 万元,2019—2020 年的总扶持金额为 100 万元,本文将村庄样本按政策扶持力度分组,考察不同的财政扶持政策力度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结果显示,仅获得 100 万元财政扶持的村庄,财政扶持对其公共服务供给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接受 200 万元财政扶持的村庄,财政扶持对其公共服务总供给和公共事业供给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效果在 1%、5% 或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 11)。可能的原因,一是财政扶持资金越充足,促进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的效果越明显,村庄能够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二是财政扶持 200 万元的村庄发展时间更长,最早投资时间距调研时间为 5 年,资金从投入到营收的时间更为充裕,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表 10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10 Results of the robustness test

稳健性检验方式	匹配方法	人均公共服务总供给		人均公共产品供给		人均公共事业供给	
		ATT	S.E.	ATT	S.E.	ATT	S.E.
替换被解释变量	k 近邻匹配 (1:2)	0.369*	0.215	0.142	0.220	0.340**	0.150
	k 近邻匹配 (1:4)	0.327*	0.190	0.155	0.183	0.288**	0.141
	卡尺匹配	0.321*	0.193	0.168	0.169	0.258**	0.132
	卡尺内 k 近邻匹配	0.321*	0.193	0.172	0.169	0.259**	0.132
	核匹配	0.299*	0.179	0.168	0.171	0.256**	0.132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0.353*	0.215	0.146	0.205	0.336**	0.163
稳健性检验方式	匹配方法	公共服务总供给		公共产品供给		公共事业供给	
		ATT	S.E.	ATT	S.E.	ATT	S.E.
替换解释变量	k 近邻匹配 (1:2)	0.234**	0.116	0.120	0.105	0.188**	0.079
	k 近邻匹配 (1:4)	0.209*	0.108	0.092	0.097	0.196***	0.075
	卡尺匹配	0.221**	0.103	0.103	0.091	0.192***	0.073
	卡尺内 k 近邻匹配	0.219**	0.104	0.102	0.093	0.191***	0.072
	核匹配	0.221**	0.103	0.103	0.092	0.192***	0.073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0.250**	0.127	0.113	0.115	0.210**	0.084

表 11 不同财政扶持力度对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
Table 11 Impact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financial support o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in village collectives

村庄分组	匹配方法	公共服务总供给		公共产品供给		公共事业供给	
		ATT	S.E.	ATT	S.E.	ATT	S.E.
财政扶持 100 万元村	k 近邻匹配 (1:2)	0.167	0.141	0.078	0.115	0.137*	0.075
	k 近邻匹配 (1:4)	0.086	0.119	0.025	0.110	0.085	0.071
	卡尺匹配	0.052	0.110	0.005	0.102	0.104	0.071
	卡尺内 k 近邻匹配	0.052	0.110	0.021	0.101	0.104	0.071
	核匹配	0.092	0.117	0.009	0.102	0.069	0.067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0.117	0.141	0.078	0.126	0.099	0.086
财政扶持 200 万元村	k 近邻匹配 (1:2)	0.489**	0.222	0.209	0.189	0.455***	0.174
	k 近邻匹配 (1:4)	0.448**	0.216	0.244	0.173	0.449***	0.168
	卡尺匹配	0.483**	0.202	0.181	0.163	0.425***	0.163
	卡尺内 k 近邻匹配	0.544***	0.192	0.206	0.165	0.508***	0.165
	核匹配	0.448**	0.191	0.200	0.162	0.434***	0.163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0.446*	0.249	0.228	0.231	0.419**	0.182

收入更充裕，更倾向于增加公共服务，而财政扶持100万元的村庄距调研时间仅为1~2年，对于产业培育或投资营收来说，资金少，时间短，因而仅对花费相对较少的公共事业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影响。对于财政扶持的两个阶段，受公共产品项目花费高、周期长的特点影响，公共产品供给的促进效果均不显著。

2) 财政扶持政策对不同类型村庄的影响。不同类型的行政村对于政策的响应程度不尽相同，政策的作用效果也有所差异。表12报告了最近邻1:2匹配的估计结果。对于公共服务总供给而言，财政扶持政策对于近郊村和大型村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近郊村的经济状况相比远郊村相对较好，同时产业更加丰富和发达，因而对于财

政扶持政策拥有更好的项目实施方案，从而公共服务供给提升显著，而远郊村囿于产业的单一和资源的匮乏，对于政策的响应和实施程度都低于近郊村，从而对公共服务供给的促进效果较差。对于人口规模而言，大型村的人口规模较大，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量也较多，同时由于人口的聚集会产生经济规模效应，公共服务提供的边际成本相较小型村而言较少，边际效应较大，因而大型村的政策促进作用更强。

对于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所有类型村庄均不显著(表12)，可见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仍需靠政府专项投资。对于公共事业供给，所有类型村庄的影响效果均显著，说明对于不同类型村庄的公共事业供给，财政扶持政策都起到了明显促进效果。

表12 距县城距离和村庄规模的异质性
Table 12 Heterogeneity in distance and village size

变量	近郊村		远郊村		小型村		大型村	
	ATT	S.E.	ATT	S.E.	ATT	S.E.	ATT	S.E.
公共服务总供给	0.384**	0.172	0.093	0.166	0.049	0.130	0.353*	0.187
公共产品供给	0.110	0.159	0.075	0.150	-0.080	0.119	-0.150	0.211
公共事业供给	0.234***	0.110	0.193**	0.088	0.197**	0.081	0.272**	0.137
样本数	271		191		280		182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研究表明，财政扶持政策对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服务总供给的影响十分显著，财政扶持政策能够实现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增长，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自我造血能力，使其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村级公共服务供给。具体而言，财政扶持政策对于造价较高，建设较为复杂的公共产品供给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于所需资金量较小，并与村民日常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公共事业供给，财政扶持政策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村庄的大型基础设施仍然需要依靠政府的项目扶持，村集体公共服务的自主供给能力仍有待加强。

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100万元扶持资金的村庄，200万元扶持资金的村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效果更明显，财政扶持政策的扶持金额和政策作用时间对于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起到关键作用。相较于远郊村和小型村，财政扶持政策对于近郊村和大型村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表明区位优势、产业发展情况和人口聚集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对于财政扶持政策的作用效果有较大影响，政府应当给予远郊村和小型村更多的关注，帮助其更好地提升

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截止本文的调研时间，财政扶持政策的实施年份较短，最早实施年份为2016年，同时这项政策仍在实施过程中。目前的研究仅限于政策实施的初期效果，未能体现政策的长期影响。后续应当围绕财政扶持政策进行长期的追踪调查，形成面板数据，以验证政策实施的效果。

4.2 政策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财政对于村级集体经济的扶持作用，进一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现阶段村级集体经济仍然较为薄弱，因此财政应当继续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并加大投入力度，帮助村级集体经济奠定产业发展基础，同时配套相关支持政策，优化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以帮助村庄更好地利用财政资金，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从而提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

第二，采取因地制宜、因村制宜的政策实施方案。欠发达地区的村庄地理位置偏远，分布不均，发展良莠不齐，因此应当根据村庄的不同特征有针对性地实施引导和帮扶政策，尤其针对政策实施效果较差的远郊村和小型村，要给予更多发展方向的指导。

第三，持续发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村级公共

服务供给中的核心作用,明确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地位,在充分利用财政资金的同时做到基础公共服务的自主供给,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减轻地方财政压力。

致谢:本文有幸于 2023 年 10 月 14 日在由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北方民族大学联合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举办的 2023 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年会、第五届兴边富民论坛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中进行汇报,特别感谢会议点评专家对文章的研究思路、内容框架等方面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参考文献:

- [1] 郭美荣,李瑾,马晨.数字乡村背景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现状与提升策略[J].中国软科学,2021(7):13-20.
Guo M R, Li J, Ma C.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motion strategy of rural basic public services[J]. China Soft Science, 2021(7): 13-20.
- [2] 陈锡文.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J].农业经济问题,2022(5):4-9.
Chen X W.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common prosperity[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2(5): 4-9.
- [3] 胡洪曙,鲁元平.公共支出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 CGSS 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12(10):23-33.
Hu H S, Lu Y P. Public expendi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citize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 data[J].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2012(10): 23-33.
- [4] 屠霁霞.抱团发展模式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浙江的经验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21,29(1):42-48.
Tu J X. Group development mode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Zhejiang province[J]. Henan Social Sciences, 2021, 29(1): 42-48.
- [5] 石欣欣,胡纹,孙远赫.可持续的乡村建设与村庄公共品供给——困境、原因与制度优化[J].城市规划,2021,45(10):45-58.
Shi X X, Hu W, Sun Y H. Sustainable rural construction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Predicaments, causes, and institutional optimization[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1, 45(10): 45-58.
- [6] 丁琼.优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J].中州学刊,2019(12):17-22.
Ding Q. The dilemma of optimizing local government's public service supply and its solution[J].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19(12): 17-22.
- [7] 卫龙宝,凌玲,阮建青.村庄特征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研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J].农业经济问题,2011,32(5):48-53,111.
Wei L B, Ling L, Ruan J Q. Study of the impact of village characteristics on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Based on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1, 32(5): 48-53, 111.
- [8] 庄文嘉,马铭.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空心化与村级公共项目投入——基于 2012—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村庄追访数据分析[J].中国公共政策评论,2020,16(1):192-207.
Zhuang W J, Ma M. Population outflow, exercise of power and public expenditure in rural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LDS data[J]. Chinese Public Policy Review, 2020, 16(1): 192-207.
- [9] Moti U G. Decentralization and access to and use of rural services in Nigeria[C]//Aapam Annual Round Table Conference Lilongwe. 2019: 117.
- [10] 雷丽霞,张应良,刘魏.村庄特征、民主治理对村级公共品供给的影响研究——基于 IAD 框架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6):62-72.
Lei L X, Zhang Y L, Liu W. Village characteristics,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th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IAD framework[J].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1, 22(6): 62-72.
- [11] 王奎泉,赵玲玲.村级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研究[J].财经论坛,2014(10):17-21.
Wang K Q, Zhao L L. A research on supplier diversification of village-level public goods[J]. Collected Essays on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4(10): 17-21.
- [12] 徐冠清,余劲.农村土地流转何以内卷化发展?——基于“不稳定性”和“社会保障”视角[J].农村经济,2023(7):36-43.
Xu G Q, Yu J. Why is rural land transfer developing with internal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ability” and “social security”[J]. Rural Economy, 2023(7): 36-43.
- [13] Lawal T. Local government and rural infrastructural delivery in Niger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Business & Social Sciences, 2014, 4(4): 139-147.
- [14] 潘璐.村集体为基础的农业组织化——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一种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2021(1):112-124.
Pan L. Village collective-base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A pathway connecting smallholders with modern agriculture[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1(1): 112-124.
- [15] 温铁军,罗士轩,马黎.资源特征、财政杠杆与新型集体经济重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7(1):52-61,226.
Wen T J, Luo S X, Ma L.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fiscal leverage and reconstruction of new collective economy[J]. 2021, 47(1): 52-61, 226.
- [16] 张军.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J].经济学(季刊),2008(1):21-52.
Zhang J. Decentralization and growth: China context[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08(1): 21-52.
- [17] 范子英,赵仁杰.财政职权、征税努力与企业税负[J].经济研究,2020,55(4):101-117.
Fan Z Y, Zhao R J. Fiscal responsibilities, tax efforts and corporate tax burden[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20, 55(4): 101-117.
- [18] 方红生,张军.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再评估:攫取之手还是援助之手?[J].管理世界,2014(2):21-31.
Fang H S, Zhang J. A reevaluation of 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the fiscal centralization: Is it a grabbing had or a helping hand?[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4(2): 21-31.
- [19] 陈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困境与解决之道[J].理论探索,2017(1):92-98.

- Chen J. The dilemma and solution of government's public service[J].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2017(1): 92-98.
- [20] 罗仁福, 张林秀, 黄季焜, 等. 村民自治、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投资[J]. 经济学(季刊), 2006(3): 1295-1310.
- Luo R F, Zhang L X, Huang J K, et al. Direct election rural tax reform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06(3): 1295-1310.
- [21] 项继权, 李晓鹏.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新机制[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4(2): 111-118.
- Xiang J Q, Li X P. “Financial rewarding and compensation system based on event-specific deliberation”: New mechanism for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in China[J]. Journal of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14(2): 111-118.
- [22] 贾康, 孙洁. 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机制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06(12): 60-66.
- Jia K, Sun J. Study on the delivery mechanism of rural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06(12): 60-66.
- [23] 王奎泉, 范诗强. 转型期村级公共品供给的机制创新[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4(1): 45-50.
- Wang K Q, Fan S Q. On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the supply of village-level public good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J]. 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4(1): 45-50.
- [24] 赵一夫, 易裕元, 牛磊.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升了村庄公共品自给能力吗? ——基于8省(自治区)171村数据的实证分析[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3(2): 52-62.
- Zhao Y F, Yi Y Y, Niu L. Has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mproved the self-sufficiency of village public good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171 villages in 8 provinces[J].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2, 23(2): 52-62.
- [25] 王海娟, 贺雪峰. 资源下乡与分利秩序的形成[J]. 学习与探索, 2015(2): 56-63.
- Wang H J, He X F. Resources to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order of benefit[J]. Study & Exploration, 2015(2): 56-63.
- [26] 桂华. 项目制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分析——以农地整治为例[J]. 政治学研究, 2014(4): 50-62.
- Gui H. Analysis on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in the countryside under project system: A case study of farmland improvements[J].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4(4): 50-62.
- [27] 黄丽芬. 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与基层善治[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1): 99-107.
- Huang L F.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grassroots good governance[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 18(1): 99-107.
- [28] 刘景琦. 论“有为集体”与“经营村庄”——乡村振兴下的村治主体角色及其实践机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2): 24-32.
- Liu J Q. On “facilitating village collective” and “operating village”: The role of village governance under village revitalization and its practical mechanism[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9(2): 24-32.
- [29] 乔翠霞, 王骥.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公共品供给的路径创新——大宁县“购买式改革”典型案例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12): 22-34.
- Qiao C X, Wang J. The path innovation of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goods supply by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 case study of “purchasing reform in Daning county”[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0(12): 22-34.
- [30] Karafolas S. Public financial support to investments in rural areas: The case of the region of Thessaly in Gree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ciences Applied Research (IJBESAR), 2013, 6(2): 81-101.
- [31] 武中哲, 韩清怀. 农村社会的公共性变迁与治理模式建构[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 15-21.
- Wu Z Z, Han Q H. The transition of the publicity of the rural soc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ing pattern[J].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6(1): 15-21.
- [32] Iqbal R M, Nugroho A, Martiastuti H I, et al.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impacts of village fund on post disaster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idie Jaya-Indonesia[C]// 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IOP Publishing, 2021, 708(1): 012070. DOI: 10.1088/1755-1315/708/1/012070.
- [33] 邓蒙芝.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及其决定因素分析——基于100个行政村的跟踪调查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 2014(3): 16-25.
- Deng M Z.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pattern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Based on the follow-up survey data analysis of 100 administrative village[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4(3): 16-25.
- [34] 赵为民. 集体行动、财政激励与村级公共产品自主供给[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5): 104-119.
- Zhao W M. Collective action, fiscal incentive and autonomous supply of public product at village level[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 18(5): 104-119.
- [35] 芦千文, 杨义武.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否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3): 84-103.
- Lu Q W, Yang Y W. Can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2(3): 84-103.
- [36] Heckman J J.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J]. Econometrica, 1979, 47(1): 153-161.
- [37] Rosenbaum P R, Rubin D B.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J]. Biometrika, 1983, 70(1): 41-45.
- [38] Rosenbaum P R, Rubin D B. Constructing a control group using multivariate matched sampling methods that incorporate the propensity score[J]. The American Statistician, 1985, 39(1): 33-38.